

张九龄“为土著姓”发微

戴伟华

内容提要 张九龄一系为岭南“土著姓”而无“门籍”，在张说未与张九龄通谱系前，张九龄上书无果、科举无成。考之张九龄所撰张说碑、徐浩所撰张九龄碑和萧昕所撰张九皋碑，二张所通谱系并不可信。二张通谱系帮助张九龄解决了身份和地域卑微的困扰，为其科举成功和仕途发展铺平了道路。

关键词 张九龄 土著姓 通谱系

张九龄作为岭南籍大家，与韶州（韶关）结缘一生：生于斯，长于斯，祉其民，思其土，归葬于斯。然而，韶关地处岭南，却给张九龄一生带来无法摆脱的烦恼和伤痛。

一 “土著姓”来自徐《碑》的记载

张九龄一系为“土著姓”出于徐浩《唐故金紫光禄大夫中书令集贤院学士知院事修国史尚书右丞相荆州大都督府长史赠大都督上柱国始兴开国伯文献张公碑铭》^①。《碑》云：“公讳九龄，字子寿，一名博物。其先范阳方城人。轩辕建国，弦弧受氏，良，位为帝师；华，才称王佐。或相韩五叶，或佐汉七貂，代有大贤，时称盛族。四代祖讳守礼，隋钟离郡涂山令。曾祖讳君政，皇朝韶州别驾，终于官舍，因为土著姓。”“土著”一词，是指世代代生于其地的人，一般是和“移民”相关联或相对应的。当然，“为土著姓”或可解释为“当地出名的大姓”，即便如此，也可以看出，张九龄家族自曾祖起已融入韶州本土，只是大姓人家而已。无论作何种表述，何种理解，在中原人眼中并无区别，张九龄就是岭南人。

徐《碑》作于至德二年（757），撰碑人徐浩与墓主张九龄关系，据《碑》称：“浩义深知己，眷以文章，礼接同人，惠兼甥舅。”张九龄开元十九年三月自桂州刺史兼岭南道按察使入拜秘书少监兼集贤院学士副知院事，而徐浩仍在充集贤校理任，二人有交往。此前，张九龄恩人张说和徐浩同在朝中，开元十六年五月玄宗作《喜雨赋》，张说、徐安贞、徐浩等均有和作。《玉海》卷三一：“唐玄宗《喜雨赋》，……张说等和者五人。……十有六年。”《张燕公集》卷一《喜雨赋》应制：“是月也，朱明已半，紫油未吐，恐降灾兮此下人，罄虔祈兮我明主。”玄宗原赋及徐安贞、贾登和作，分见《全唐文》卷二〇、卷三〇五、卷四〇〇。徐浩在集贤校理任，奉和御制诗赋，甚为张说赏重，谓为后进之英。《旧唐书·徐浩传》：“以文学为张说所器重，调授鲁山主簿。说荐为集贤校理，三迁右拾遗，仍为校理。”《全唐文》卷四四五张式《徐浩神道碑》：“始擢汝州鲁山主簿，□□□卑，时论称之。无何诏征，俾□□贤院。大学士燕国公张，文之沧溟，间代宗师，尝览公应制《喜雨赋》及《五色鸂鶒赋》兼和制等诗，曰：‘后进之英，今知所在。’□为上闻，赐帛出于中禁，依声播于乐府。”^②张说、张九龄、徐浩三人关系非

① 《曲江张文献公集》，上海书店1994年版，《丛书集成续编》第99册，第257—261页。

② 傅璇琮《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初盛唐卷”，辽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631页。

同一般。不仅如此，张九龄弟九皋于徐浩亦有推奖之功，张式《碑》云：“迁金部员外郎，转都官郎中，充岭南（阙八字）求成俗，事多诈滥，吏（阙四字）公（阙二字）洁（阙四字）憎枉，信义必行于夷獠，廉平可动于鬼神，五岭百越，颂声四合，同诣方面，请建旌德碑。都督张九皋为之飞章，朝议以为主圣臣忠，（阙一字）建圣德颂，人到于今歌之。”^①基于徐浩与张说、张九龄及张九皋的关系，其所作张九龄碑或有过誉之处，但所述平生诸端当与事实相符。换言之徐作张碑，有可为之讳者则必为之讳。徐浩写《碑》时为何要交待张九龄之曾祖“皇朝韶州别驾，终于官舍，因为土著姓”，依通行撰碑体式，徐《碑》可写成“皇朝韶州别驾，终于官舍，因家于此”。《旧唐书》本传即云：“张九龄，字子寿，一名博物。曾祖君政，韶州别驾，因家于始兴，今为曲江人。”《新唐书》本传亦云：“张九龄，字子寿，韶州曲江人。”而徐安贞《唐故尚书右丞赠荆州大都始兴公阴堂志铭并序》：“公姓张氏，讳九龄，其先范阳人，四代祖因官居此地。”《张九皋神道碑》云：“公讳九皋，其先范阳人也……皇朝以因官乐土，家于曲江。”

徐安贞《铭》、九皋碑、徐浩《碑》分别作于公元741、769、757年。张九龄自忤旨见逐直至去世，即离开政治中心。公元755年发生的安史之乱，才使玄宗想起张九龄生前的谏劝，安史之乱前，张九龄曾建议除去安禄山，徐《碑》云：“平卢将安禄山入朝奏事，见于庙堂，以为必乱中原，固请戮之。”可玄宗不纳，“及羯胡乱常，犬戎逆命，元宗追叹曰：‘自公歿后，不复闻忠谏言。’发中使至韶州吊祭”。此事经历史学者的描述，张九龄的政治才能和“先见之明”的智慧得到抬升，身经安史之乱的人备感张九龄英明预见，而此时徐浩撰碑出于对张九龄的崇敬无论从公或私两方面来说都应美言才是，徐浩特别提到“因为土著姓”当是不得不书之事。

徐《碑》一直存世，嘉庆时温汝适见之。温汝适刻《曲江集》在乾隆五十七年，嘉庆丁丑春增入四十余条，“复访公神道碑于韶阳，则又半在土中，雨淋日炙，剥落愈甚。属友人拓寄两纸，其淡墨一纸尚清晰，晴窗展阅，十得五六，可正附刻公集……此碑存而公之年寿、官爵、事迹多可补史所未备，其裨于考古岂浅鲜哉！余故深以得见石本为幸也。汝适又识”^②。所谓神道碑即徐浩《碑》，据温汝适批注，“高七尺余，连篆额宽四尺余，额云唐尚书右丞中书令张公碑”。“因为土著姓”处温批云：“因为土著姓，今字已缺，但只得四格，必有衍字。”撰人徐浩结衔：银青光禄大夫广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持节充岭南节度支度营（三字原作“度支盐”，据原碑改）田五府经略观察处置等使上柱国会稽开国公^③。碑中“因为土著姓”成缺字，铲去数字者应是被触痛处的张家后人，因其最明“土著姓”之底细和内涵。被铲去的时间约在张九龄后人立碑之时。从“因为土著姓”数字被铲去，亦可断定徐浩文中“土著姓”应是“土著之姓”而非“土之著姓”的意思。

二 二张所通之谱系不可信

在张九龄仕途发展上，张说是最重要的角色，而且发挥了别人无法替代的作用。人们对此关注颇多，而尤有可述者在于二张通谱系之实际情况和意义。

在唐代无来由的通谱系叙昭穆极少见，据查《新唐书》有四例，依其性质也可概括为四类：（一）出于当权者私利需要，如《新唐书·后妃传上》云：“以浮屠薛怀义为使督作。怀义，鄆人，本冯氏，名小宝，伟岸淫毒，佯狂洛阳市，千金公主嬖之。主上言：‘小宝可入侍。’后召与私，悦之。欲掩迹，得通籍出入，使祝发为浮屠，拜白马寺主。诏与太平公主婿薛绍通昭穆，绍父事之。”^④这是唐代历史

① 《全唐文》卷四四五，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4542页。

② 温汝适《曲江集考证序》，《曲江张文献公集》，第431页。

③ 《曲江张文献公集》，第257—261页。

④ 《新唐书》卷七六《后妃传上》，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479—3480页。

上最大丑闻之一。(二)趋炎附势的需要,如马植攀附马元贽,“初,左军中尉马元贽最为帝宠信,赐通天犀带。而植素与元贽善,至通昭穆,元贽以赐带遗之”^①。(三)出于仰慕之情,罗绍威与罗隐通谱系即是,“绍威多聚书,至万卷。江东罗隐工为诗,绍威厚币结之,通谱系昭穆,因目己所为诗为《偷江东集》云”^②。

张说与张九龄通谱系是强者对弱者的提携,此为第四例。《新唐书》张九龄本传云:“会张说谪岭南,一见厚遇之。”“改司勋员外郎。时张说为宰相,亲重之,与通谱系,常曰:‘后出词人之冠也。’”^③至于张说与九龄通谱系的时间有不同说法,当以长安三年(703)说为是^④。即张说被贬岭南,过韶州,张九龄以文章为贽拜见张说,张说欣赏其文,并与之通谱系,即徐《碑》所云:“燕公过岭,一见文章,并深提拂,厚为礼敬。”前列《新唐书》三例,皆为无中生有,同姓之间并无所谓传承有序的同宗共祖的关系,故《新唐书》特为标出。换言之,当时所谓通谱系叙昭穆实质上只是出于某种目的的造假手段。

(一)比照张九龄所撰张说碑、徐浩所撰张九龄碑和萧昕所撰张九皋碑,可知所叙张九龄世系阙失而传承失序。

其一,张九龄《故开府仪同三司行尚书左丞相燕国公赠太师张公墓志铭并序》。《志》云:“公讳说,字道济,范阳方城人。晋司空壮武公之裔孙,周通道馆学士讳弋,府君之曾孙,庆州都督讳恪,府君之孙,赠丹州刺史刑部尚书讳鹭,府君之季子:自上世积庆,及公而祥发。”^⑤晋司空壮武公,即张华,《晋书·张华传》云:“久之,论前后忠勋,进封壮武郡公。华十余让,中诏敦譬,乃受。数年,代下邳王晃为司空,领著作。”此墓志铭当写于开元十九年(731),墓志上推张说祖先为张华,没有再向上推,表现出非常谨慎的态度,张华之后由张弋续上。张九龄所述张说谱系当即二张通谱系之世系,《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大致承此说。而徐浩《碑》尽管在张华前又上推,但张华与张守礼之间中断了。

而孙逖《唐故幽州都督河北节度使燕国文贞张公遗爱颂并序》云:“有唐开府仪同三司行尚书左丞赠太师燕国文贞公讳说,字道济。张氏,圣文神武皇帝佐命之臣也。开元六祀,宅于幽朔。及公既歿,御撰丰碑……昔周有张仲,是称孝友;汉有留侯,见推筹画。太守飞声于朔野,司空迈绩于西晋。”以张仲始,张仲,周宣王时人,《诗经·小雅·六月》“侯谁在矣,张仲孝友”。《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载周宣王时有卿士张仲。孙逖对二张谱系不明,故又在张良前追溯到张仲。

其二,徐浩《唐尚书右丞相中书令张公神道碑》。《碑》云:“其先范阳方城人。轩辕建国,弦弧受氏,良,位为帝师;华,才称王佐。或相韩五叶,或佐汉七貂,代有大贤,时称盛族。四代祖讳守礼,隋钟离郡涂山令。曾祖讳君政,皇朝韶州别驾,终于官舍,因为土著姓。”但徐浩又把谱系弄混了,“相韩五叶”对应的是“位为帝师”的张良,按文脉“佐汉七貂”应承“才称王佐”的张华,而张华不可能佐汉,“佐汉七貂”指张安世,即下引张九皋《碑》之“安世以七叶荣汉”之“安世”。张安世,张汤子,自张汤而后,张家世代显贵于中朝,《汉书·张汤传》载:“安世长子千秋与霍光子禹俱为中将,将兵随度辽将军范明友击乌桓。还,谒大将军光,问千秋战斗方略,山川形势,千秋口对兵事,画地成图,无所忘失。光复问禹,禹不能记,曰:‘皆有文书。’光由是贤千秋,以禹为不材,叹曰:‘霍氏世衰,张氏兴矣!’及禹诛灭,而安世子孙相继,自宣、元以来为侍中、中常侍、诸曹散骑、列校尉者凡十余人。功臣之世,唯有金氏、张氏,亲近宠贵,比于外戚。”而关于张良与张汤的关系,《汉书》赞曰:“冯商称张汤之先与留侯同祖,而司马迁不言,故阙焉。”

其三,萧昕《唐银青光禄大夫岭南五府节度经略采访处置等使摄御史中丞赐紫金鱼袋殿中监南康

① 《新唐书》卷一八四,第5391页。

② 《新唐书》卷二一〇,第5943页。

③ 《新唐书》卷一二六,第4424、4427页。

④ 顾建国《张九龄年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9—30页。

⑤ 《全唐文》卷二九三,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2965页。

县开国伯赠扬州大都督长史张公神道碑》。《碑》写于大历四年（769），云：“公讳九皋，其先范阳人也。昔轩辕少子，以弦弧受氏，别封于张。留侯以五代相韩，安世以七叶荣汉，特生间气，钟美大贤。余庆遗芳，袭于令嗣矣。晋末以永嘉南渡，迁于江表；皇朝以因官乐土，家于曲江。”墓主为张九龄之弟张九皋。张良和张汤的关系，司马迁阙如，故班固不书，而此处仍然书写，是为主人贴金。值得注意的是，张九皋《碑》张安世下并未提到张华，由张安世直接到了张守礼。依照常理，墓志叙其远祖不断添枝加叶，踵事增华，但萧昕撰墓志略去了张家最为重要的所谓远祖张华，即张说碑之“晋司空壮武公”、张九龄碑之“才称王佐”之张华。张九皋碑晚出，显然在这里张说和张九龄同祖张华的说法得到实际的澄清，至于其后人又要追张华为远祖，那又是另一回事了。

（二）徐《碑》写于张九龄去世后十八年，其《碑》中谱系皆为张说和张九龄通谱系后梳理出来的，认定共同祖先为晋张华，由张华为中心上推下联完成的。而徐《碑》“因为土著姓”才是最为信实的。由此可以得知，张九龄一支早已被人们认作韶州“土著姓”，至少在张说过岭南通谱系之前如此。

（三）玄宗对张九龄的批评也佐证了徐浩“因为土著姓”的记载。《大唐新语》云：“牛仙客为凉州都督，节财省费，军储所积万计……玄宗大悦，将拜为尚书。张九龄谏曰：‘不可……仙客本河湟一吏典耳，拔升清流，齿班常伯，此官邪也。又欲封之，良为不可……尤不可列地封之。’玄宗怒曰：‘卿以仙客寒士嫌之耶？若是，如卿岂有门籍！’九龄顿首曰：‘荒陬贱类，陛下过听，以文学用臣。仙客起自胥吏，目不知书。韩信，淮阴一壮士耳，羞与绛灌同列。陛下必用仙客，臣亦耻之。’玄宗不悦。”^①门籍，门第和身份。《旧唐书·李林甫传》记载此事，文字稍异：“玄宗欲行实封之命，兼为尚书，九龄执奏如初。帝变色曰：‘事总由卿？’九龄顿首曰：‘陛下使臣待罪宰相，事有未允，臣合尽言。违忤圣情，合当万死。’玄宗曰：‘卿以仙客无门籍耶？卿有何门阀？’九龄对曰：‘臣荒微贱，仙客中华之士。然陛下擢臣践台阁，掌纶诰；仙客本河湟一使典，目不识文字，若大任之，臣恐非宜。’林甫退而言曰：‘但有材识，何必辞学；天子用人，何有不可？’玄宗滋不悦。”^②张九龄自称“荒微贱”、“荒陬贱类”，其涵义自明。而张说在朝中也有敌对势力，如和张九龄同为张华之后，为何没有人揭他的短处，称他“无门籍”？就是在张说死后加谥的争论中，阳伯诚《驳太常燕国公张说谥议》言辞很重，说到“玉之有瑕，尚可磨也；人之斯玷，焉可逭焉”的地步，但也丝毫没有提及张说“门籍”方面有问题的事情。

总之，徐《碑》云张九龄“为土著姓”和张九皋碑不再称张华为其先祖，都是为了回应舆论长期以来的猜测和批评，别无他解。

另外，徐《碑》云“太夫人乐在南国，不欲北辕，克勤奉养，深得妇礼”，字面上是表扬张九龄夫人谭氏“深得妇礼”，实际上也透露出张母为本地土著，不习惯北方风土、言语习俗，而“乐在南国”。只语言交流一项足以让太夫人乐在南国，中唐柳宗元贬岭北的永州，已感到南北语音的巨大差异，其《与萧翰林俛书》云：“楚、越间声音特异，舛舌啁噪，今听之怡然不怪，已与为类矣。家生小童，皆自然晓晓，昼夜满耳，闻北人言，则啼呼走匿，虽病夫亦但然骇之。”因居永州久，习惯了地方土语，小孩听北人言反觉大怪。习惯讲岭南土话的太夫人哪能去听北人言语。九龄的父亲和土著通婚一事也可以佐证张九龄“为土著姓”。

三 二张未通谱系前的张九龄

张九龄为韶州土著姓，经张说与之通谱系被确认为张华之后。二张在未通谱系前，张九龄的生存状况实在不如人意，作为韶州“土著姓”，他个人奋斗并未停止过，甚至作过很大努力，徐《碑》载二

① 刘肃《大唐新语》卷七《识量第十四》，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04—105页。

② 《旧唐书》卷一〇六，第3236—3237页。

事是其最突出者。

第一，上书王方庆。

徐浩《碑》云：“弱不好弄，七岁能文……王公方庆出牧广州，时年十三，上书路左。”九龄年十三就上书广州都督王方庆。唐人上书年龄在十五岁以下并不多见。王勃早慧苦学，且为大儒王通之孙。其年十五上书刘祥道。时在麟德元年。《杨炯集》卷三《王勃集序》：“年十有四，时誉斯归。太常伯刘公巡行风俗，见而异之，曰：‘此神童也。’因加表荐。”《新唐书·王勃传》：“麟德初，刘祥道巡行关内，勃上书自陈，祥道表于朝，对策高第。”《王子安集注》卷五有《上刘右相表》。刘祥道麟德元年八月以司列太常伯兼右相，十二月罢，见《新唐书·宰相表上》；本年八月为持节大使，见《旧唐书·高宗纪上》。书当上于本年八月至十二月间^①。罗联添以为：“王勃应幽素举及第，得力于刘祥道之引荐。唯据《旧唐书》本纪，刘祥道于麟德元年（664）八月至十二月任右相，而乾封元年（666）任右相者为刘仁轨，此书言及封禅事，当非麟德元年所作。所谓刘右相，应指刘仁轨。”此书言及封禅事云云，即《上刘右相表》（《全唐文》卷一七九作《上刘右相书》）有“张乐岱郊，腾勋社首”语^②。九龄十三岁上书都督王方庆，应是非常之举。据徐《碑》上书并无结果，而《旧唐书》张九龄传则云：“年十三，以书干广州刺史王方庆，大嗟赏之，曰：‘此子必能致远。’”以王方庆的学识，对十三岁的儿童讲这样的话，最多只能理解为是鼓励而已，再说《旧唐书》的记载来自于徐《碑》，徐《碑》无“此子必能致远”语，此语或为《旧唐书》撰者据张九龄平生事业添加的。至于有一种说法认为九龄上书王方庆地点应在广州，理由是九龄之父时为索卢县丞，知新州等州事，索卢县在今广东省新兴县南，邻近广州。其实，张九龄上书王方庆最有可能是韶州曲江或始兴，因为南下之人过岭经过韶州，而王方庆为广州都督过岭经韶州时，张九龄上书，故徐《碑》云“上书路左”，路左，即道旁。九龄登第之年，方庆卒，《旧唐书》卷八九本传：“是岁正授太子左庶子。……长安二年五月卒。……方庆博学好著述，所撰杂书凡二百余卷。”《新唐书》卷一一六本传：“方庆博学，练朝章，著书二百余篇，尤精《三礼》。学者有所咨质，酬复渊诣，故门人次为《杂礼答问》。家聚书多，不减秘府，图画皆异本。”从万岁通天（696、697）中以年老乞身的记载看，方庆时年也当近七十，即十三岁的张九龄上书王方庆时，方庆年已六十余。方庆为儒家名家，年岁颇高，不至于对十三岁的岭南人有“必能致远”的期许，张九龄本人也不应对此次上书道左有太多的期待。

第二，参加科举考试。

徐《碑》：“弱冠乡试进士，考功郎沈佺期尤所激扬，一举高第。时有下等，谤议上闻。”关于张九龄科举事，顾建国《张九龄年谱》有辨析^③。张九龄第一次参加科举考试的时间在长安二年（702），知贡举为考功郎沈佺期。这次考试虽然为沈佺期举为高第，但“时有下等，谤议上闻”。至于何以招致谤议的原因，有种种推测，其中之一是因沈佺期受贿，使本次考试作废。果真如此，张九龄可能就不会得到重试的机会。《唐律疏议》卷九“贡举非其人”条：“诸贡举非其人及应贡举而不贡举者，一人徒一年，二人加一等，罪止徒三年。”所谓“非其人”就是“德行乖僻，不如举状者”，疏议曰：“若使名实乖违，即是不如举状，纵使试得及第，亦退而获罪。”可知举子参加科举者皆有举状，“举状”和“家状”或有区别，但必包括家状的内容，家状为家庭状况表，主要有籍贯、三代名讳等内容，但在细节上不同时代当有所不同。因此可以有一假设，张九龄来自岭南，其举状或有“名实乖违”的地方，因被举为高第，为落第者不满而遭到揭发。“名实乖违”处最有可能是张九龄在举状上对籍贯的填写，如写自己远祖为范阳人，或附注为张华之后。按法律应获罪，但此事也并不是很快能搞清楚的，或查无实据，故九龄虽“亦退”而未“获罪”返乡。这一次对张九龄的打击非常大，或许他对仕途已经绝望。

① 傅璇琮《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初盛唐卷”，第183页。

② 罗联添《唐代文学论集》（上），台湾学生书局1989年版，第49—50页。

③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6—28页。

又颜真卿《朝议大夫赠梁州都督上柱国徐府君神道碑铭》：“（徐秀）年十五，为崇文生应举，考功员外郎沈佺期再试《东堂壁画赋》，公援翰立成，沈公骇异之，遂擢高第。调补幽都县尉，充相国尚书赵彦昭朔方节度判官。”^①长安二年，据《登科记考》，进士二十一人，知贡举：沈佺期。徐秀擢第后被任职，说明此次考试不是全部作废，张九龄事只是个案。

至此还有九龄从叔张弘雅举明经及第一事需作探讨。《广东通志》卷三〇四《列传三十七》：“高宗显庆四年岭南帅府举宏雅明经，填帖皆中首得及第，粤俗自是彬彬多经学士矣。”宏雅即张弘雅，其明经及第疑问很多：《登科记考》未见载录；兄弟中弘矩任洪州参军，弘载为端州录事，弘显为戎城令，独弘雅无仕宦记录；“岭南帅府举明经”意思不明；“粤俗自是彬彬多经学士”亦与事实相违。可见此则材料是撰通志者出于乡恋情结，杂凑而成，故不足信。

张九龄为一代名相，生平事迹基本清楚，特别是参加科举考试这样的大事，不至于模糊不清。事实上他的第一次科举考试受阻情况已难知其详，其中当有隐情难以言说，这正是徐浩《碑》记载含混不清的原因。

四 张说与张九龄通谱系价值重估

张说对张九龄的帮助提携有目共睹，推究二张结缘之始，在张说过韶州之时，但对通谱系之事的认识很不充分。从《新唐书》所叙通谱系叙昭穆诸例，不难体会张说与张九龄通谱系，可能会承担道德责任和舆论风险。

由此看来，张说能和张九龄通谱系，对张九龄参加科举进入仕途至关重要，可以设想，张说未和张九龄通谱系也许就见不到开元名相张九龄了，二张通谱系在当时具有如下意义：

（一）身份确认。从《唐代墓志汇编》^②所载墓志来看，唐人重视谱谍，如：“并凝华赵壁，湛量黄陂，茂范神襟，清通简要，既详于谱谍，今略言之。”（显庆〇三六，第251页）“高门令族，国史家谍详焉。”（光宅〇〇六，第725页）“国史之所具详，家谍于焉甄序。”（垂拱〇六八，第778页）“高门贵族，史谍详焉。”（长寿〇二〇，第846页）撰墓者叙述墓主谱系是要参照墓主家人提供的谱谍。而墓志中也以高门鼎族相标榜，如：“以此高门，爰归鼎族。”（武德〇〇四，第12页）“高门鼎盛，台辅继踵。”（开明〇〇三，第7页）“秦中著姓，河北高门。”（贞观〇一三，第18页）“高门鼎族，作嫔君子。”（贞观〇三〇，第29页）“蝉联华族，崛岉高门。”（永徽〇〇三，第133页）“高门华族，可略而言矣。”（永徽一四二，第224页）“六奇秘策，七叶高门。”（显庆〇五九，第268页）“鸛弈高门，蝉联遐祉。”（显庆〇七八，第283页）“门传轩冕，代袭忠良。”（显庆〇九一，第285页）“作俚高门，教深中馈。”（显庆〇九七，第289页）“作俚高门，秦晋之配。”（显庆一二五，第308页）“高门盛族，来适居子。”（显庆一三五，第315页）“高门鼎胄，辉映一时。”（龙朔〇二七，第355页）“乃毓庆高门，嫔媛公族。”（乾封〇一二，第449页）“峨峨高门，英英茂族。”（总章〇〇二，第483页）从墓主谱系和仕履看，有些人并非高门鼎族，但撰墓者为抬高墓主地位，也不顾事实，许为高门。这至少看出当时人们的价值取向。二张通谱系解决了困扰张九龄的身份问题。

（二）地域确认。唐代岭南和中原水土人情迥异，其落后程度透过一些文献记录可见一斑。李翱《唐故金紫光禄大夫检校礼部尚书使持节都督广州诸军事兼广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岭南节度营田观察制置本管经略等使东海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徐公行状》：“四十余年，刺史相循居于县城，州城与公田三百顷皆为墟，县令、丞、尉杂处民屋。”^③权德舆《金紫光禄大夫检校礼部尚书使持节都督广州诸军事兼

① 《颜鲁公文集》卷八，四部丛刊初编集部。

②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③ 《全唐文》卷六三九，第6458页。

广州刺史御史大夫充岭南节度支度营田观察处置本管经略等使东海郡开国公赠太子少保徐公墓志铭并序》：“江汉既清，拜韶州刺史。先是长史不任职，官曹弛废，刺史寓于理下，邑之令丞与编人杂处，比屋庸亡，公田为芜。”^①州府如此，何论其余。而生长此地的土著，被人鄙视，不足为怪。二张通谱系后，张九龄不仅身份得到改变，而“范阳方城人”的地域确认也使他和当地人有了本质的区别。

（三）如果上述张九龄第一次科举失败的推测是正确的话，通谱系也为张九龄重入科场增添了信心和可能。如上所考，张九龄初次参加科举考试，因举状上冒认范阳人、张华之后，而遭人揭发，遂被退还原地而险被定罪，故在张说过岭南赏九龄文章之时，叙谈中张九龄应提及其事，张说才与之通谱系。不然，二张初次见面迅即通谱系就失去了由头。

因此，张九龄本人对互通谱系的价值有深刻认识：一方面感激终生，《祭张燕公文》所述感人肺腑。其私心在公事中也难掩饰殆尽，其《停张说中书令制》文可以看出张九龄下笔之难，费尽心机，文中极力张大表扬之处，对其缺点作了巧妙的掩护：“而不察细微之人，颇乖周慎之旨。”一方面自卑自怜，史称张九龄行事谨慎，故时常提醒自己，屡言“臣实单人，本无大用……臣独何人，谬居此地”（《让起复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表》）、“臣本单族，过蒙奖拔”（《谢工部侍郎集贤学士状》）、“臣山藪陋材，岂堪国用”（《谢两弟移官就养状》）、“微躯贱貌”（《谢赐药状》）、“生身蓬荜”（《让赐宅状》），对玄宗面称“荒微贱”、“荒陋贱类”。这些言辞固然在形式上有尊君之需要，也含有因家族卑微、地域荒僻的自卑。九龄为岭南“土著姓”在当时也有人注意到，玄宗的批评已是明证。徐浩撰碑既称其为张华之后，又云其“因为土著姓”；张九皋碑已在传承谱系中去掉张华为其先祖一节：这都在逐步回应舆论、回归事实。

徐《碑》乃大手笔大杰作，这些问题被处理得很有分寸感。例如：“公讳九龄，字子寿，一名博物。其先范阳方城人。轩辕建国，弦弧受氏，良，位为帝师；华，才称王佐。或相韩五叶，或佐汉七貂，代有大贤，时称盛族。四代祖讳守礼，隋钟离郡涂山令。曾祖讳君政，皇朝韶州别驾，终于官舍，因为土著姓。”既承认张华为其祖先，也称其“土著姓”，前者对得起朋友兼恩人，后者对得起历史和舆论。于明白处讲得很明白，于含糊处讲得也很含糊。又如：“燕公过岭，一见文章，并深提拂，厚为礼敬。”“并深提拂”，大有深意，提拂之深之重无过于张说与之通谱系。其意义在张九龄《祭张燕公文》有所表示：“追惟小子，夙荷深期。一顾增价，二纪及兹。非驩殆之足数，盖枝叶以见贻。”“一顾增价”是有相当分量的话。而“枝叶以见贻”句常为人所忽视，其实这一句是对通谱系之事讲得最明白的，“枝叶”比喻同宗旁支，《左传·文公七年》：“公族，公室之枝叶也。若去之，则本根无所庇荫矣。”也就是说张九龄是张华一系的旁支，因为张华和张守礼之间已无法续全谱系，而这同宗旁支的身份也是张说“见贻”的结果。《祭张燕公文》九龄自称“族子”。张九龄一夜之间由无来历的岭南人因“通谱系”而成为张华之后，所增之价及其意义被张九龄后来的行迹所证明。

毋庸置疑，在张九龄的人生历程中，张说与张九龄通谱系的价值怎样高估都不过分。而揭开张九龄“为土著姓”之迷，对探讨其思想、行事和创作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

[作者单位]戴伟华，华南师范大学岭南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发表过专著《地域文化与唐代诗歌》等。

^① 《全唐文》卷五〇二，第5108—5109页。